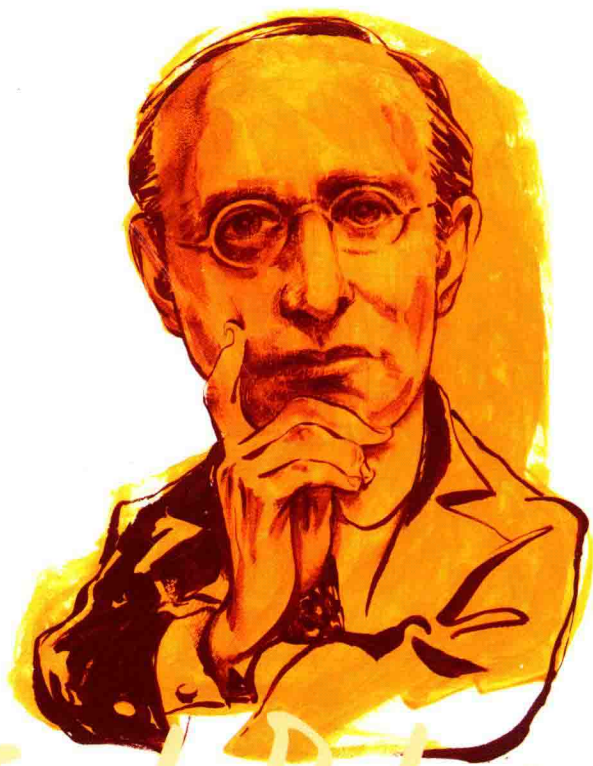


〔英〕加雷斯·戴尔 (Gareth Dale) — 著
张慧玉 杨梅 印家甜 — 译



Karl Polanyi
A Life on the Left

卡尔·波兰尼传

20 世纪极具辨识力、洞察力与远见的经济史学家传记

中信出版集团

〔英〕加雷斯·戴尔 (Gareth Dale) — 著
张慧玉 杨梅 印家甜 — 译



Karl Polanyi
A Life on the Left

卡尔·波兰尼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波兰尼传 / (英) 加雷斯·戴尔著; 张慧玉, 杨梅, 印家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9

书名原文: Karl Polanyi

ISBN 978-7-5086-7802-3

I. ①卡… II. ①加… ②张… ③杨… ④印… III.

①卡尔·波兰尼 (1886-1964) —传记 IV.

①K835.1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6932 号

Karl Polanyi: A Life on the Left

By Gareth Dale

Copyright © 201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卡尔·波兰尼传

著 者: [英] 加雷斯·戴尔

译 者: 张慧玉 杨 梅 印家甜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2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802-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前 言

在研究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 我得到许多人的善意帮助, 尤其是波兰尼的家人、朋友和学生。特别感谢卡丽·波兰尼-莱维特 (Kari Polanyi-Levitt), 她很友善、耐心地接受了我一轮又一轮的采访: 2006~2008 年在蒙特利尔有五次面访; 2007~2009 年有七次电话采访; 而 2006~2015 年, 她无数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接受我的后续随访。也感谢其他乐意回答我问题的被访者: 唐·格兰特 (Don Grant, 2009 年 5 月 13 日, 伦敦; 2013 年和 2015 年又提供了额外的材料)、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2009 年 9 月 12 日, 莫斯科东西方酒店——该酒店取名甚为恰当)、伊斯特万·梅萨罗斯 (Istvan Meszaros, 2010 年 12 月 12 日, 伦敦)、阿比·罗特斯坦 (Abe Rotstein, 2009 年 5 月 16 日, 电话采访)、罗伯特·海拉兹 (Robert Halasz)、珍·理查德 (Jean Richards, 2011 年 8 月 17 日, 电话采访)、米拉利·西玛依 (Mihály Simai, 2008 年 12 月 11 日,

蒙特利尔)、格雷戈里·鲍姆 (Gregory Baum, 2009 年 1 月 11 日, 电话采访)、安妮·查普曼 (Anne Chapman, 2009 年 7 月 19 日, 电话采访)。其中, 安妮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认识的最热心、最有魅力的人之一, 然而, 她已于 2010 年逝世, 我十分伤心。

同时, 我很幸运地收集到许多档案资料, 里面有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文本材料, 包括波兰尼本人及他的妻子伊洛娜·丹兹斯卡 (Ilona Duczynska)、学生、朋友、熟人撰写的回忆录、通信、文章片段、读书笔记、大事记等。大量参考的资料原文为德语或匈牙利语, 其中大多数德语资料的翻译 (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 由我本人完成, 而匈牙利语文本资料的翻译和摘要工作则基本由亚当·法布里 (Adam Fabry) 完成, 金高·绍陶 (Kinga Sata) 参与了部分工作。这绝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波兰尼的笔迹十分潦草, 甚至他的医生 (我们都知道医生开的处方是最潦草的) 都请求他把字写得清楚易读一些。我和亚当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地研究他的通信记录, 逐个辨认那些乱如蜘蛛网般的文字——那真是终生难忘的记忆! 因此, 特别由衷地感谢亚当和绍陶博士, 同时也感谢资助他们完成这些工作的纳菲尔德基金会 (Nuffield Foundation) 与阿米尔-莫尔本信托基金 (Amiel-Melburne Trust)。同样还要感谢在蒙特利尔接待我的主人马蒂厄·丹尼斯 (Mathieu Denis) 和弗里德里克·丹尼斯 (Frédérique Denis)。感谢布鲁内尔大学商学院、社科学院, 以及利普曼-米利班德信托基金 (Lippman-Miliband Trust), 它们分别于 2006 年、2008

年及 2010 年资助了我在蒙特利尔的费用。我前往芝加哥、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调研差旅，以及 2014 年的蒙特利尔和纽约访问，都由于有其他活动而意外成行，这些活动得到英国科学院、维也纳大学、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以及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90 周年纪念会议”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推荐、介绍了本书重点探索的几个叙事及背景群体，包括中欧的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以及英国不同的贵格社会主义者（Quaker socialist）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分支，这些对本书的背景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感谢那些直接帮助我审读文稿章节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评论与批评极大地提高了书中实证探讨的准确性与观点的一致性。由衷地感谢卡丽·波兰尼-莱维特、克里斯·汉恩（Chris Hann）、约翰·霍尔（John Hall），他们都帮助我从头到尾梳理了文稿。感谢唐·格兰特、托马斯·于贝尔（Thomas Uebel）、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Gilman），他们每个人都帮助我点评了一个章节。感谢露丝·达农（Ruth Danon）、丹·汤普金斯（Dan Tompkins）、马蒂·莫利斯基（Marty Moleski）、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蒂伯·弗兰克（Tibor Frank）、尤迪特·萨伯尔（Judit Szapor）、马修·格里姆利（Matthew Grimley），他们在本书的细节上给予了帮助。我参考运用的档案资料包括：卡尔·波兰尼档案资料（收藏于蒙特利尔康卡迪

亚大学，迈克尔·波兰尼论文系列（收藏于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波兰尼家族论文系列（收藏于布达佩斯塞切尼国家图书馆），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的档案资料（收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三套与卡尔·波兰尼、奥斯卡·贾西（Oscar Jaszi）、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相关的论文集（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在参考文献列表中，这些档案资料的名称都用缩写表示，并用数字标明具体的文件夹与文件盒。例如，KPA-23-9 指的是 23 号文件盒、9 号文件夹中的卡尔·波兰尼档案资料。其他档案资料名称的缩写为 MPP、PFP、SPSL、OJP 以及 RMP。感谢上述几个机构档案管理员的帮助，特别是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阿纳·戈麦斯（Ana Gomez）。充裕的原始资料对本书有如神助，但尝试对这些资料进行尽可能忠实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挑战，如资料筛选与证据零碎的问题、见证人以及原作者阐释主观性的问题、多次重写文本或突出部分观点与词句（可能原作者并不想如此突出这些）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鉴于当前人们对波兰尼的生活与工作十分感兴趣，我们希望参考文献中的任何错误都能很快得到指正，同时大家可以就差异化的解读展开探讨。

最后，必须就文字拼写加以说明：对在英语社会为人知晓的匈牙利人，本书采用其英语名字，而对其他匈牙利人则保留其匈牙利语名字。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在“东西方沙龙”中成长 /015

马扎尔——犹太混血儿 /025

“非犹”犹太人的矛盾 /035

多瑙河上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激进的反主流文化 /041

世界主义的逻辑，基督教式的结论 /048

第二章 背负战争的十字架 /053

振兴“荒地” /056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霸权计划 /064

备受折磨的灵魂和糟糕的机器 /068

转瞬即逝的菊花 /077

奴隶起义，带着卡巴莱歌舞表演 /083

第三章 红色维也纳的荣耀与悲剧 /89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功能反常” /101

初期新自由主义与计算论战 /109

红色笼罩下的城市 /119

沉船船长 /129

第四章 挑战与对策 /135

逃避法西斯主义 /141

病毒诊断 /145

辅助激进主义 /152

贝列尔学院“群英会” /157

马克思主义：完善基督教精神 /163

莫斯科苦难 /166

加宽美国的护城河 /171

爱家之心 /175

对市场系统恨之入骨 /181

第五章 大灾难及其起源 /187

一生的激情 /199

谋杀机制 /207

新民主匈牙利 /211

战后计划 /221

第六章 “不公正与不人道” /233

波兰尼的选择，伊洛娜的审判 /238

一起漂泊：研究协作 /253

机器中的市场 /261

经济学家的钟摆 /271

山上之城 /277

第七章 生存岌岌可危 /281

老罪人 /285

自由与技术 /292

兄弟关系缓和 /301

社会主义的“精神再生” /310

《共存》 /318

笼罩布达佩斯的黄昏 /325

结 语 /329

注 释 /338

引 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卡尔·波兰尼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兄弟俩及其朋友格奥尔格·卢卡斯（Georg Lukacs）、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组成了一个“匈牙利四人流亡帮”，全力以赴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及精神危机把脉。这是一项特别适合他们的任务。兄弟俩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度过的。匈牙利是奥匈帝国较为脆弱的组合体。奥匈帝国创立于被普鲁士击败之时，后因自身军队暴动而灭亡，是一个短命且易被忘却的帝国。波兰尼兄弟共同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动乱与冲突：匈牙利资本主义以极快的速度扩张，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帝国体系以更快的速度向单一民族国家体系转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时引发了终止大战的各种革命；经济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兴起以及“大萧条”出现。

他们的父辈生活于19世纪中期，那时，帝国瓦解、法西斯迫害还都不曾发生，因此自由的中产阶级对新时代抱有很乐观的态度。匈牙利作家费伦茨·科门迪（Ferenc Körmendi）的成长小说《快活一代》（*The Happy Generation*）中的人物拉斯洛·海格杜斯（Laszlo Hegedüs）对此描述得非常到位。他欢欣鼓舞地说：“这将是一个快活的时代，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快活！噢，这是多么快活的时代！科学促使文明大步向前，人类知识正在不断拓展，每天我们都

在向人类福利、国家和平以及人心和谐的圣殿上添砖加瓦。”¹当时，灿烂辉煌的社会发展正如火如荼，而匈牙利沉浸在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在波兰尼出生之前，匈牙利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2%；在他童年时期，数据增长到7%；而在他十几岁时，数据接近9%。布达佩斯正是经济增长的中心。1873年，当布达（Buda）、佩斯（Pest）以及老布达（Óbuda）最初合并统一时，人口刚刚超过3万；而到1900年，布达佩斯人口超过6万，从不起眼的小城一跃成为欧洲第六大都市。

布达佩斯是一个极具反差感的城市。波兰尼无须离开居住的街区，就能去剧场或歌剧院看演出，听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做练习，也可以看欧洲大陆第一条地下铁路耀眼的铁轨降低到设定的位置。地平线上，烟雾从奇兹佩斯（Kiszpest）平原之外的工厂和贫民窟上空升腾而起。理论上来说，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但实际上，自封建时代起，基于土地产权的劳工关系便几乎未变动。部分地区的饮食条件非常恶劣，以致有的人直到20岁才变声。²与布达佩斯在欧洲大陆凸显的大都会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几乎是一种愚昧的荒原。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赌场经济兴盛的城市开诚布公地将大都会的繁荣与羞耻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毫不掩饰其唯利是图的一面。而往另一个方向开车或坐几个小时火车，便是维也纳。作为帝国首都的布达佩斯在这样的“文化实验”中苦苦挣扎，为市场机会以及一种崭新的个人主义触动脉搏。而就在此处此刻，这种方法论式的个人主义最先被引入经济理论中；也是在此处，心理治疗师作为人生意义的引导者，比牧师更受欢迎。

资本主义让各个社会经历突破与合并，由此产生的愿景冲突在这片反差强烈的哈布斯堡帝国心灵版图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传统上来讲，这种冲突代表了启蒙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反应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法理社会，这是一种单纯的、普遍性的社会观，崇尚个人主义、人权、市场自由与世界主义；另一方面是礼俗社会，这是一种保守或提倡共同主义的社会观，崇尚公共连通性与文化特殊性。³波兰尼所属的布达佩斯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所谓的“伟大的一代”——其中包括卢卡斯、曼海姆、波兰尼兄弟、奥斯卡·贾西、欧文·绍博（Ervin Szabó）、艺术批评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与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诗人翁德雷·厄岱（Endre Ady）、作曲家巴托克与佐尔坦·柯达伊（Zoltan Kodaly）、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物理学家利奥·齐拉德（Leo Szilard）与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他们因这一“哈布斯堡困境”而焦躁不安，深受其扰，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落后，同时敏感地了解欧洲其他地区正在开展的政治与知识创新运动。因此，在玛丽·格拉克（Mary Gluck）看来，与西欧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对现实更加失望，也更加热情、迫切地尝试改变未来”。作为东欧人，他们始终感觉自己“多少置身于西欧的发展之外”；而作为犹太人，他们许多人都被“关注自我、日渐反犹太的民族群体”排除在外。格拉克认为，他们无法在匈牙利世纪之交贫瘠的土壤中找到扎根式的归属感，因而对仿佛与自己无关的礼俗社会产生怀旧之感。⁴

虽然波兰尼有时候被视为一位礼俗社会思想家，但更多的时候被视为一位思想集成者、一位思想自由的探寻共同社会的人文主义

者。正因如此，他注定格格不入，纠结在自由与共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中。二者之间的矛盾曾是（现在也依然是）政治哲学中主导创造性的张力所在——对个体与社群的责任形成有相反的牵引力，遵从个体行为的信念与承担社群生活维护、发展的责任之间构成分歧性需求。在他看来，具有独立道德良知的自反主义者越来越多，这是值得称道的成果；而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任何否定个体必须对未来共有社会承担责任的观念。他认为，具有尊严与道德的生活，必须建立在接受个体责任或职责的基础之上（在个人层面，波兰尼是公民职责的“灵魂捍卫者”。他坚持认为，“公民有缴税的义务”，“无法容忍那些讨论如何避税的言论”。⁵在他看来，如果公民职责得不到履行，那么个体自由便如得不到滋养的枯萎灌木丛一般）。同样地，他也支持一条互补性的原则，即政府在道义上有责任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一思想在他支持的政治运动中得到了证实，其中，较早的一个是“自由社会主义”运动，另一个是他短暂“客串”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该运动倡导的不是施蒂纳式的个人主义，而是基督教式的个人主义，其“名义领袖”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当他反而支持社会主义传统时，实际上指的是其中“吉尔特社会主义”的化身，该运动虽然倡导“老式英国个人主义”、保护公民对国家的权利，⁶但认为自由和义务在原则上必须以群体的形式来界定，即公民各群体的权利与责任取决于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功能。之后，他参与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群体中，这些群体的责任理念是共同货币，其中蕴含的责任高于其他一切对社会的责任，这与遵守现有制度、服从社会领袖的责任理念截然不同。⁷

“伟大的一代”中诸多知识分子支持社会主义潮流的某个分支，始于1914年的十年战争与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各个分支的分歧大大增加。这时，这些人重组到不同的旗帜下。波兰尼直接参战了，但卢卡斯没有参战。战争结束后，二人进行了一场公开政治对决：波兰尼认为当时所处的时代经受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因而发出理想主义号召，要求构建社会组织的伦理基础；而卢卡斯倡导行动导向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以使之适应社会危机时代的革命现实。他们进行辩论时，匈牙利发生了一场革命动乱，持续了整整十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陷入“白色恐怖”，这迫使包括波兰尼和卢卡斯在内的诸多人士必须逃离祖国。二人的目标国是奥地利，而迈克尔·波兰尼与曼海姆选择逃到了德国。

大约十年之后，法西斯主义当道，四人再次走上流亡之路：卢卡斯到了莫斯科，其他三人到了英国。他们都开始探寻政治动乱的原因，这些动乱给他们自身、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四个人集中精力，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社会诊脉。在卢卡斯看来，问题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断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活动仅仅对原子化个体做出孤立的回应，而相应地，社会主导的思想观念无法把存在的经验理解为“整体的某个部分，即历史变革过程中社会整体的某个部分”。⁸劳动人民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证的存在，一方面作为有政治意识的人，另一方面作为客观化的商品，他们既能够把社会过程看作一个整体，也很想冲破物化的樊篱。在曼海姆看来，社会在自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已经分化成各种独立的圈子，即“经纪人、宗教人、政治人”等。⁹自由个人主义和市场体制的兴起导致社会原子化，并促使社会价值体系从属于经济。在